

政治人类学评论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view

2015 · 1

政治学·人类学的 对话与融合

Dialogue, Integr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第 1 辑

陶 庆 ·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第 1 辑

政·治·人·类·学·评·论 (2015·1)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view

政治学·人类学的 对话与融合

Dialogue, Integr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陶 庆·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人类学的对话与融合/陶庆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政治人类学评论. 第1辑)
ISBN 978-7-5520-1004-6

I. ①政... II. ①陶... III. ①政治人类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7324 号

政治学·人类学的对话与融合

主 编: 陶庆

责任编辑: 路征远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004-6/D·325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办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政治人类学研究所（筹）

主 编

陶 庆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浦劬 和少英 何国强 范 可 周 平 罗红光 林尚立 赵旭东
竺乾威 徐 勇 钱 杭 徐杰舜 高丙中 商红日 阮云星 董建辉
蔡 骥 Chuan-Kang Shih

编委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徐 勇 高丙中

责任编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澍原 张科甲 罗 君

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学术刊物”类建设项目

“《政治人类学评论》（培育）”

资助成果（A-7031-15-004023）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重大项目

“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资助成果（11JJD810018）

中国政治学离不开“田野研究”(代序)

徐 勇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恰逢其时。

一个学科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与现实更迫切地呼唤“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政治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有待于实证研究的更好运用。就我本人而言,如果说我是政治学出身的话,更确切地说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身。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经典著作就是马列经典,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政治学著作可阅读。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学术训练,可以说,奠定了我以后独立思考并从事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

作者简介:

徐勇(1955—),男,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多年来的田野研究,使我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我认为,这一研究思路应该上升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首先,实证研究的理论预设问题。应该说,实证研究在中国政治学学界长期未得到重视。即使是运用实证研究最多的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恢复不久,也在实证研究方面较为欠缺。因此,实证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的运用就如我前面谈到的,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运用的。研究者只是知道应该做实地调查,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更不知道怎样做。在做调查之前,普遍缺乏应有的理论预设,即对调查的主题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缺乏足够明晰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为了调查而调查,学术增量不够。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做实证研究,不是“理论先行”,先入为主,但是要有理论预设。经过实证研究之后,可能证实预设,也可能证明当初的判断不对。有了理论预设之后,可以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调查更加集中,不至于造成漫无边际的陈述。

其次,科学规范问题。实证研

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有着严格的逻辑、准则和程序。但是中国的实证研究者们普遍缺乏严格的科学规范训练、缺乏实证研究的基本知识,更不知实证研究的基本准则,不少人对实证研究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以为只要下乡就是进入田野,以为实地调查就是实证研究,误认为田野日记与调查报告就是实证研究成果。这种理解、这种方式大大降低了实证研究的质量:其一,实证研究变为证实研究。有人做调查并不是从事实中出结论,而是为自己的观点找根据。最典型的是南街村调查,同样一个村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实际上是“乌托邦”研究的变种。其二,狭隘的经验主义。到一个地方看了看,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个新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再次,价值中立原则被抛弃。我不反对学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但是科学研究应该避免价值问题干扰,学术研究应该做到价值中立。现在不少政治学研究者怀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要为民代言、为民请命,而且将自己的这种道德关怀注入实证研究中,得

出来的结论与现实大相径庭。科学规范的不够大大损害了研究的科学性,更不能保证结论的科学性。

最后,调查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实证研究在中国主要与一些课题联系在一起,大多为某些应用性的政策研究。所以,课题一结束,调查也结束了,原有的调查点也放弃了。而一项研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才能获得准确真实的事实或者掌握其变化情况,一劳永逸式的实证难以有真正的发现。科学研究的展开有两个层面:其一,横向层面的共性考察,即通过几个个案、几千个样本进行横向归纳,发现样本之间的共性。这种研究的特点就是能较快地得到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其二,纵向层面的历时考察,即通过长时间的历史考察,发现变化之间的因果性或者相关性。这种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时段长,对个案的变化可有一个深度的挖掘。在政治学中,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横向层面的调查做得比较多,但是纵向的调查做得比较少。其实,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论,一方面,需要放在长时段的实践中去观察才能够得到;另一方面,需要从尽可能多的案

例中寻找。

政治学科学化也是政治学由“洛克时代”进入到“托克维尔时代”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发展。所谓“洛克时代”就是理性政治学的时代。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洛克等先贤从人类理性出发,构造未来政治社会的架构,指出人类政治社会的方向,提供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但当人类政治社会进入大变革之时,所展示的图景远非理想状态,甚至充满着非理性成分。这是理性政治学所始料未及,也难以解释的。托克维尔因此出场,他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从人类政治发展的根源和影响因子的角度思考着现实为何不如理性政治学所展示的那样。历史政治学并不提供答案,但它的解释已为如何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

当今世界政治学处在大迷茫时期。20世纪末,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位政治学者匆忙宣布“历史的终结”,人类政治社会似乎按照某一条道路走下去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但仅仅是20多年,同样是这位政治学者也深感人类政治社会发展远远不如他所预想的那么惬意,于是他自己又匆忙地去寻求原因。

当下的中国政治学也显得有些沉寂和落寞。我们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某种东西是“好东西”，但这种“好东西”的实现似乎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么简单，甚至广为人所怀疑，只是这种怀疑也并没有提供多少令人信服的依据。政治愿景究竟如何，政治现实又如何这般？学界没有提供太多有价值的论述。而一位美国学术大家在数十年前对中国历史的观察，能够为我们提供许多方法论启示。在美国学者费正清看来：要从复线而不是单线的角度理解传统中国，一类是“持久性的变革”，指“不可逆转的趋势”；一类是“周期式的变动”，指“钟摆式的变动”。这一基于历史事实的认识对于理解当下中国也不无启迪。

政治学本来是一门需要足够定力的学科。但当下的政治学因为入世太深，急于表达而显得根基不牢。无论是对未来世界的构想，还是对现实世界的剖析，政治学都未能达到洛克和托克维尔等先贤的高度和深度，也许当下世界政治的碎片化和学术体制的碎片化都无法造就出个别学术大家，而只能依靠由众多学者组合合成的“大家”。而这个学术共同体

的“大家”需要相互讨论的平台。

就我本人长期以来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而言，犹为如此。坦率地讲，我的政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方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探讨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现成的思路。

我经历了五年“下乡”，当了三年工人后，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留校工作，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的不幸的话，我们开始学术研究则刚好乘上了“改革”的东风。同当时的大多数学人一样，我也曾为改革开放后理论的活跃和思想的奔放而兴奋不已。但是，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的心中逐渐生出些许遗憾。一是人们较多地沉浸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用，而对我们自己脚下的大地关注较少；二是在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提法中夹杂着浓厚的浮躁之气，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的事实依据。

特别是就政治学学科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新中国政治学的真正建立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即使这样，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对于

中国政治学却也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政治学陷入低谷之时,也促使着一些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以往的“殿堂”政治和注解性的政治学研究,并试图寻求政治学研究的新进路。在1991年,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上层,而对于社会基层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80年代正处于传统与未来的交汇处,对历史的轻率否定和对未来的超前追求常常将人们的思维定位于“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层面。这种“应该怎样”的理想主义倾向能激发起人们的热情,但也容易滑向大而不当、脱离客观实际的思维误区。进入9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应该更多地自上而下延伸,从简单地定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强调思维的具体、精致和客观性。我于1992年出版的著作《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就试图提出并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上层政治不断地变动,而社会并没有发生结构上的变革?为解决此问题,在书中我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即将政治分为

两个层面:一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上层政治;一是与基层社会相关的基层政治,并认为后者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由此也将自己的研究视角调整到基层社会,特别是长期以来与城市发展有巨大差距的农村社会。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农村出现的村民自治就为我的“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了直接契机。

真正的学术创新不是一件易事,需要有原创性,减少重复性。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事实为基础,强调实践理性,避免理想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根据多年的乡村调查、实验和研究,我认为:一定要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行为和首创精神,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教训,更是基本原则。

如果要对我历经的和正在从事的政治学研究作一总结的话,这一路线图大致为:在中国政治学陷入低谷的困境时,提出了“政治体系”一分为二的研究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深入田野调查,将实证分析方法带入了政治学研究;在

“三农”问题纷杂的争论中,自己“脱身而出”,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化小农”两个理论分析视角,解释“田野”与“殿堂”的互动;在理论与方法的统合中,试图实现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通过“百村十年观察”和“中国农村数据库”两大工程的建设实现学术资源的整合,为学术研究的历史跨越奠定基础。

中国实践正在不断产生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也将不断丰富中国理论。要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必须根据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进行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做政治学的学问,要有问题意识,还要有学术想象力。科学研究需要发现并提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开放性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然后,要脚踏实地、充分掌握事实材料,根据事实逻辑展开严谨的陈述和论证;最后,试图得出一个具有一定说服力的结论。

当然,政治科学研究中的“田野研究”仍存在一个理论提升的问题。

一方面,现实问题作为“问题导向”的研究,我们要不断回归学术本位。也许某一现实问题在不远的

将来就不存在了,但是作为学术研究要常新常青。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有理论的总结和提升,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其实,中国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但是目前的概括、总结和提升还远远不够充分。实证研究不仅重视“是什么”,还要解释“为什么”。因为任何事实背后都有一定的逻辑根源。“发现事实”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弄清楚“事实为何如此”,并建立起相应的解释模型。由于缺乏严格的科学训练和不注重学术积累,整体而言,实证研究目前还处于最原始的阶段,即采集“矿石”的阶段。实地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调查前缺乏必要的理论预设,调查后缺乏应有的学术分析,以至于实证研究的学理知识含量较低,出现所谓的“只见描述,不见解释”的状况。更有甚者,出现了不少“出口转内销”现象,即外国学者借在中国所取得的调查资料进行“精加工”,产生理论观点,转而影响中国学者。如“过密化”“有增长无发展”“经纪人”“内卷化”“蜂窝状”“依法抗争”“共同体”理论等。所以,尽管中国的实证研究在政治学的运用已有

十多年时间,但我们还没有产生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

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有自身的“限度”,需要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于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的研究方法有所转变,注重理论概括和提升。这一思路的转变源于学术自觉;近5年,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现代国家理论,研究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国家是如何通过“政权下乡”“政党下乡”“行政下乡”“法律下乡”“政策下乡”“服务下乡”等方式进入并整合、塑造乡土社会的;二是提出“社会化小农”的观点,试图运用这一理论从生产、生活、交往等方面把握和解释当今的农民和农村。其实,这两个分析视角的提出,也试图说明一点:政治学研究在实现了由“殿堂”到“田野”的同时,也需要从“田野”走向“殿堂”,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

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田野研究”,这更是中国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政

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自然是恰逢其时,也必将为政治人类学的进步作出贡献。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既非常古老,又十分年轻。说其古老,是作为一种以事实为基础进行追根溯源研究的学科方法很早就为人运用;说其年轻,是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且活跃于当下。政治人类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为中国政治学界所关注,一些学者也自觉不自觉运用其方法来研究问题,但总体上一直进展不大。重要原因之一,是学界长期处于向前赶路的状态,而缺乏对政治发展复杂过程的历史反省。当匆匆赶路面临着不少“陷阱”时,人们也许就会回头来追根溯源问“为什么”,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回答“怎么样”的问题。政治人类学因此应运而生,也将大行其道。

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学建设需要伸出我们的双手,来拥抱广袤的世界;更需要迈出我们的双腿,去投身希望的“田野”。

是为序。

徐 勇

2015年8月7日

前 言

政治人类学 (Political Anthropology) 的学科思想远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家,中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开始酝酿形成较为成形的学科体系,并在 20 世纪 40 年代终成一门规范的学科,迄今才七十多年历史。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近代以来,包括人类学和政治学在内的诸多领域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研究人类的权力与权利互动关系,以及各类政治组织与繁杂政治活动,形成了门派迥异、学科多元、涉猎广泛的著述文章。这些学者或许并没有

直接标榜自己的作品属于政治人类学范畴,但他们实际上从各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角度推动了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生长与发展,因而,都属于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奠基人。

政治人类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 20 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伊斯顿-科恩之问”的悖论。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早期着迷于讨论无国家社会、无政府政治的简单社会,沉浸于人类学的“浪漫”意境之中。正因为此,“政治系统论”创立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科学学者戴维·伊斯顿 (David Easton) 1959 年撰文

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价值与学科体系表示了怀疑,甚至否认了人类学的“政治学”抱负。1969年,伦敦亚非学院(SOAS)的人类学家阿伯勒·科恩(Abner Cohen)从学术上对伊斯顿的学术怀疑作出了合理的回应。他认为政治人类学不仅存在,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使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领域和学科显得有所不同。阿伯勒·科恩对于戴维·伊斯顿的回应重新确立了政治人类学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学术地位,但政治学界似乎仍然保持着伊斯顿的怀疑立场。从那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对于政治人类学这个学术话题,政治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都相互敬而远之,态度谨慎,双方持有“井水不犯河水”般的“雅度”。

随着学术交流与学科交融的不断增多,国内外学界正在逐步形成学术共识: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交叉而成的一门新兴学科。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从西方学术界引介政治人类学,西方学术界在学科划分上没有过于固化的学科分类传统,相反倒是趋于学科边界模糊化、学科交叉边缘化、学科融合多元化;但迄今为止,政治人类

学在我国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尚未定位,它游离于我国学科代码表之外,缺乏正式学科“身份”。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政治学与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各自为阵,开设讲授政治人类学课程,研究著述政治人类学成果;但学科之间少有学术对话与知识连结,难以产生学术共同体。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实际存在的这种“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的窘境,是学界前辈一直诟病的现象。长期以来,学界前辈与当今同仁试图突破政治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学科壁垒,付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今天我们能够继续探索的宝贵智识,奠定了今天我们能够持久前行的坚实基础。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创办,一方面,试图破解中国学界实际存在的政治学与人类学之间在某些共同研究领域里实际存在着的自说自话、互不买账等“两张皮”现象;另一方面,试图融合跨学科诸要素,探索源于政治学与人类学等学科内涵,最终超越这两个学科并形成新型交叉学科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政治人类学不应该

是“政治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简单“合并”或“相加”，更不是哪一个单独学科内涵的单向度外延。或许，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政治人类学，按照亚里士多德有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钱学森有关“非加和性”的系统论原理，可以成为以政治学学科的权利与权力、以人类学学科的文化象征、民族志的文化书写为一般要素，专门从田野研究的角度和象征符号的层面，来研究一切社会共同体（包括家庭、宗族、社会组织、政党组织、国家、国际组织等）在网状联系形态下所产生一切类型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及其文化符号的综合性交叉新型学科？或许，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正期待着更多的学人在实践中给予回应。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系统是有组织的和被组织化的给定集合，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创办具有学科建设与学科整合的旨趣，即通过分析政治人类学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诸元素之间结构性关系，以及研究政治人类学各

要素并通过融合各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等尝试，来探讨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结构功能与发展路径。

新世纪以来，政治人类学有了新发展，并拓展到诸多复杂社会，涵盖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党机构、国家政权和国际组织等一切“权力场”；政治人类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其有别于其他相关领域和相关学科。如今，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着眼于分析人类活动的政治性和象征性，认为权力通过象征符号手段来表现；所有象征符号都具有政治含义，政治行为与文化象征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时空限制被彻底打破，并延伸到分析全球化对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政治人类学研究致力于理解权力和权威在人类社会怎样产生出来和如何运作，力求认识与处理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利之间良性互动的内在本质关系。它既研究正式的国家组织与政治权威，也研究包括“非国家权力”“非政府权力”“非合法性”在内的社会组织和人类行为；既研究政治学与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交叉融合现象，也研究中

国与海外的微观实证政治现象。特别重要的是,“一般系统论”泛起,突破了“政治系统论”囿于单一学科的思维模式;政治人类学作为学科整体,远远大于政治学与人类学的简单“相加”,政治人类学已经越来越增强了整体性系统性的学科生命力。

就政治人类学的学科范畴而言,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它更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的田野工作(fieldwork study)、“深描”为手法的民族志(Ethnography)与政治学“扎根理论”(earthbounded theory)三位一体,由此,构成政治人类学学科内容;强调通过对特定地域时空,即“他我”的参与观察,形成有关“他我”政治文化的“民族志”书写文本,“深描”权力的发生、运行、异化、解构与重构等社会事实,揭示文化因素在权力领域中的普遍性作用,建构解决“本我”社会问题的“扎根理论”。

就政治人类学的适用范围而言,它适用于集权体制与非集权体制、制度性政治参与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族群政治与国家治理、边

缘群体与国际社会等一切社会形态和一切社会组织的“权力场”。

就政治人类学的学科特征而言,政治人类学表现为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三位一体的学科特点,它是多种学科交互影响,彼此融合的交叉、新兴、整体性学科。一方面,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科学化,即政治科学的两大范式之一,其基础是长时段的田野研究与“深描”为手法的民族志书写文本。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别来自于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区别,也即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的区别。政治科学经历15世纪至19世纪历史—比较主义发展阶段、法律—制度主义阶段和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行为主义发展阶段,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学成为共识。行为主义研究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科学的学科分类,使政治科学真正地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总之,《政治人类学评论》侧重于梳理政治学学科史中所包括的政治人类学理论内涵;特别是从中外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学术分野和学术融合的学科发展史中,揭示政治人类学从“哲学”迈向“科学”,又

从“科学”回归“哲学”，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文化社会人类学正在扬弃传统片面的“科学性”，向着政治哲学的公平、正义与道德之维转身，凸显了张扬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权力场”之合法性的本质内在性。19世纪末之前，人类学仍是以研究人类生物特征为主流的自然科学，直到1901年美国提出“文化人类学”范畴，特别是1922年英国形成“社会人类学”范畴（现在统称为“文化社会人类学”），它才逐步演变成为以研究人类文化特征为主流的综合性学科。文化社会人类学最初崇尚“文化的科学”，形成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20世纪60年代始，转而追求“文化的解释”，形成了象征人类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成为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核心议题，形成了以文化多元与政治多样性为主流的后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总之，《政治人类学评论》侧重于梳理人类学学科中所包括的理论内涵；特别是从文化社会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中，揭示政治人类学从“政治文化的科学”迈向“政治文化的解释”，最终又上升到“政治文化的多元”的

学科发展路径。再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唯一载体即民族志的书写文本，如何能够通过“多声道”“对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构民主政治的平等、多元与合作的制度框架。民族志是研究者通过长时段田野调查方法，对某一认识客体（文化他者）的生活经历进行“深描”的书写文本，目的是认识他者的社会和文化；同时，民族志具有跨学科特征，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社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所不在，成为贯穿多学科发展的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民族志已不同于最初的“文化的科学”之定位，已经发展成为“文化的解释”并向“文化的多元”模式即“写文化”方向演进。总之，《政治人类学评论》侧重于梳理政治人类学“扎根理论”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本质；揭示政治人类学“扎根理论”从单向度的科学实证维度，向多元参与多维共建的发展路径，以及从简单事实罗列向文化象征符号演绎的发展逻辑。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创办，还将着手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框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即政治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范